



“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围猎’中被人捕获”。

习近平总书记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了领导干部要防止被“围猎”的问题。不妨先来看看，“围猎”都“长”什么样儿？

“围猎”，往往从这里就开始了

看到下面这个故事，有的人觉得惋惜，有的人以为“围猎”不过如此，又有多少人在看透封建官场的同时，深忧“围猎”可能有着某种基因？这其实是一个“围猎”者功亏一簣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鲁迅的爷爷周福清。鲁迅曾写道：“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个变故指的正是周福清的事，因其家仆陶阿顺的笨拙，导致事泄，周福清入狱，周家败落。

当时，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报名参加在浙江举行的乡试，主考官正是当年与周福清一同考中进士的殷如璋。今天，面对这种关系，多少人都会开动脑筋，看看能不能走走后门。一看到亲戚、朋友得居关键岗位，就开始琢磨着找他办点事。很多规则，就是在这种开动脑筋后被突破的。“围猎”，往往从这里就开始了。

周福清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信，既有作弊的关节，又有承诺“洋银一万元”的纸条。假如不是其谋事不密导致事败，这种事，在封建官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记载的。

周福清想来想去，怕人看见不好，就让家仆陶阿顺代送，自己则在船上等。估计在他看来，这种跑腿的小事，怎么会出问题？让他没想到的是，阴沟里还真就翻船了。

说当时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一并送上，不巧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官周锡恩在闲话。殷如璋这种官场老油条，不看当然也知道信中有内容，却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随手搁置桌旁，让陶阿顺先回去。

这种不在意的样子，深谙此道的人自然了然会明白，但陶阿顺却未见过，他原本就是干活的粗人，哪懂得这类袖里乾坤的关窍？一等二等都没见殷如璋有什么反应，临了急了，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这封信是关系银钱的大事，还是要当面给个回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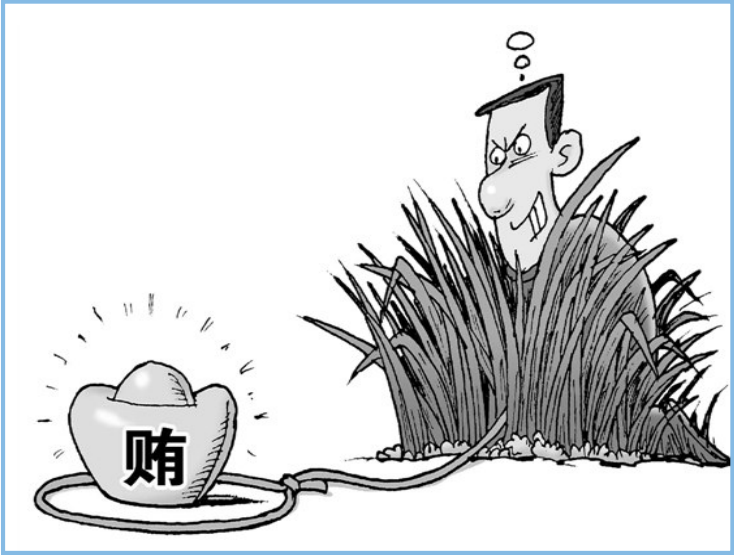
这一声，无疑就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副主考官周锡恩焉能听不懂？殷如

“围猎”与防守

□ 陈家兴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领导干部慎独，强调“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道理正在于，慎独是最好的底线，自律是对“围猎”最好的防守。



量派谁去管一事。

这点手段，对于凤姐来说可谓小菜一碟，几句话就搞定了。腐败弄权者通常就是有这等本事，以为公为幌子，以徇私为目的，却全不露一点为私的痕迹，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反让人佩服他一心为公着想，万事周全考虑。决策者决策时，当有此一警，既要提醒自己不要当了贾政，也要警惕那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凤姐们的弄权。

弄权者毕竟不是直接掌权者，凤姐做人情还得贾璉搭个桥，由贾璉告诉贾政用谁。因此听得贾璉被唤去，凤姐就可嘱咐他要如此这般说。贾璉听了不依，想给贾芸，却被凤姐一番软硬兼施。硬的是，凤姐见贾璉不依，便“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地瞅着贾璉道：‘你当真的，还是玩话？’”软的是，双方形成妥协，答应等园里种树种草的工程出来，就给贾芸。这一妥协，当然皆大欢喜，结果自然是贾府里的银子遭殃。

凤姐既可谓“贪内助”的典型代表，又可谓既能干又能腐的化身。《红楼梦》里关于她这方面的笔墨甚多。自古以来多少人弄权腐败，都或多或少有这种人的影子。从贾芸谋事这一节中，即可见她弄权腐败的本事。

弄权者随性，答应的事未必就会板上钉钉，何况凤姐答应的是贾璉，而不是直接的行贿者贾芸？估计贾芸深谙此道，明白此事求贾璉不行，得改求凤姐，却不露声色，轻松骗过了贾璉而另寻途径。

在贾芸看来，求凤姐办事，没有贵重礼物是不行的，送不到心坎上更是不行。贾芸机巧，想到正是端阳节采买香料药饵之际，送冰片、麝香必然可心。他先是等候凤姐出来，“深

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便把奉承排场的功夫做足，说得凤姐“满脸是笑”。

一番奉承过后，便是关键的送礼了。他把千辛万苦得来的冰片、麝香，却说是朋友家开香铺，因要外任便把这细贵的货送予他的，最后“想来想去，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适，方不算糟蹋这东西。”这行贿的技巧可谓极善曲承其意，往往都是给足了面子与里子，让人感觉没一点不舒坦、不妥当。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面对诸如此类的行贿，没一番境界修为，只怕皆是欣然笑纳了。

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有多少人内心里会认为对贾芸这样的行贿者应当警惕，又有多少人会打心眼认为贾芸会来事、会办事，还有多少人对其行贿办事技巧回味无穷再三、必欲习之而后快？

“围猎”，往往就是在脸上做足了文章

自古而今，行贿受贿就是一件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其行事者多隐秘，而手段又千奇百状。若非行事者自陈，旁人则往往无从知晓。但无论是“会办事”的贾芸，还是“不会办事”的阿顺，都可以看出，行贿受贿者都注重讲求颜面。在这种颜面搭建的虚幻布幕中，最终双方都会认为，自己不是在搞腐败，不是办见不得人的事，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不妥当处，而是在光明正大地行事，一

方坦然送之，一方坦然受之。“围猎”，往往就是在颜面上做足了文章。

陶阿顺们撕毁了这个颜面，恐怕再贪腐的人也不会轻易贪受。但世间陶阿顺们何其少，贾芸们何其多？贾芸们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极度呵护这个颜面，让对方感觉通体无比舒坦，再不想贪腐的人也会觉得很受用，半遮半掩、半推半就地跌进陷阱中去了，更何况那些原本就有心贪腐的人呢？

然而，让人无语的是，当受贿者如饥似渴时，行贿者就根本用不着“围猎”技巧，因为他们就等着你去“围猎”，甚至主动送上门来。双方连基本的颜面客套都不搞了，一点外衣都不穿，赤裸裸地交易了。

前些年，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就举例说，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一位厅长办事，老板就拿了一张他桌上的纸，写了给你3000万的纸条，厅长一看，把纸当场吞了，最后就给老板办事。

还有苏荣的贪内助于丽芳，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而苏荣就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什么东西都要，事办得成、办不成都收，甚至收了钱也不办事。连一些行贿人都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

苏荣自己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真是没亲身经历，还真想不出这么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与场景。

在这类毫无遮掩、腐败如斯的贪官面前，估计那些讲求“围猎”技巧的人都会慨叹世风日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行贿已经不讲技巧直接拼金钱实力了。如此腐化堕落之辈，倘若不除，更去其根源，确乎为祸一方，贻害无穷。

为官做人，设置自己的底线很重要

对于贪腐者，特别是那些到了要钱不要脸地步的人而言，对行贿者设置的诱饵自然是如蝇逐臭，并不需要行贿者顾及颜面，搞什么行贿技巧。而最终，等待他们的则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里想说的是，面对贾芸们的“围猎”，面对糖衣炮弹的温柔进攻，那些“在山泉水清”的刚出道者，又该如何防范，不致跌入“出山泉水浊”的轨道？

必须正视，贾芸们的行贿技巧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他们会制造各种再舒适不过的情境，会让你觉得没一点儿不妥当，甚至会让你觉得却之不恭、不收都对不起他。面对千奇百状的行贿，恐怕设置自己的底线至关重要。

明代文学家叶盛写过一篇散文

《郑牢论戒贪》，道理深刻，发人深省。说的是有个叫山云的将军被派到广西任总兵官。他对郑牢说：“世谓为将者不讲贪，矧（况且）广西素尚货利，我亦可贪否？”山云说的是世情，一则人们对于将军并不以贪腐来评价，而只看他能不能打仗；二则广西这个地方的风气就是如此。因而入乡随俗，贪受笑纳是常理，也没有人觉得不妥。郑牢就以“白袍点墨”为喻，意谓染污后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山云又问：“人云土夷馈送，苟不纳之，彼必疑且忿，奈何？”这简直道出了今天许多人的想法，就是人家送东西来了，你却不收，人家就会不高兴，你就没法开展工作，等等。郑牢的回答，则如一顿棒喝：“居官黷货，则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蛮子耶？”讲的是，当官贪财，必受重惩，哪有不怕杀头反而怕这些人不高兴的道理？这一棒喝，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不啻是最好的清醒剂。

世间多少人就是没想通这个理，面对贾芸们，他们总是觉得不收怕他们不高兴，怕他们不支持自己，怕他们以后给自己挖坑处处碰壁。然而，收了就难回头，最终等待自己的是党纪国法之利剑。不收的所谓“严肃性”，与收了的严重性，二者孰轻孰重，不难判断。一些人毫不在意，或铤而走险，恐怕还是侥幸心理作祟，真如有落马者所反思的：把反腐当成了隔墙扔砖头，以为被砸中的概率很小。

是以，为官做人，设置自己的底线很重要，“白袍点墨”就是底线，从一开始就一点也不沾染。不管人情世务，还是温柔“围猎”，抑或赤裸诱惑，守住自己底线的刚性就能清浊立判，而不致稀里糊涂涂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就是设置底线的高人。比如，他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以“不受私谒”为底线。当时他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举荐提拔的，为报答杨震之恩，暮夜特备黄金十斤送给杨震。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

这就是底线的力量，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技巧，一碰自己的底线就立马警醒，决不给对方以什么借口。这看似很无情，甚至很绝情，也很让对方下不来台，但在对方心里，又会赢得多少敬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领导干部慎独，强调“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道理正在于，慎独是最好的底线，自律是对“围猎”最好的防守。

随想录

烛窗心影

寻访看花宫

□ 万晓林

看花宫不是宫，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一个晚秋的下，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陕西省旬邑湫头镇的看花宫村。不为看花，只为了解中国人民

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的点点滴滴。

陕北公学的旧址就在路东边临沟的院落和依着沟边挖出的一排又一排窑洞里，远远望去，由于规模较大，加之长期没有住户，显得有些荒芜，有的已经坍塌。

按路标指引，穿过村中窄窄的街道，右拐数十步，就看到坐东向西两座院子，门口挂着陕北公学旧址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块牌子。院门不高，我低下头走了进去。

一位身着粉红色外套的年轻媳妇走上前来，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作了简单的登记，告诉我她姓何，村上人，弟弟在此上班，刚回家吃饭了，让姐姐给代会个班。她完全可以给我解忧。

听小何讲，陕北公学是1937年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为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所办的一座革命大学。1937年9月1日，在延安杨家湾正式开学。1938年7月7日在旬邑县看花宫村设立分校。由于延安供应紧张，1939年1月总校也迁来看花宫与分校合并，11月又迁回延安，改组为华北联合大学后，迁往张家口。新中国成立后，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

两座院子是相通的，都不大，一共不足一亩地。前院正对进门的是三孔窑洞，分别为李维汉书记、成仿吾校长的办公室兼居室和教务处旧址，左右是两排厦房（关中农村半边盖的房子称为厦房），一边是工作人员用房，一边是革命文物陈列展览室。陈列着学员用过的课本、步枪、馒头、马

灯、马扎儿等。东面墙上是学生名单，我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田家英、卓琳、于若木、张露萍……

后面院子有一座上房，四五间许，是当时公学的会议室。现展出李维汉、成仿吾同志和一批师生的照片、简历等。当时，学员较多，大部分散住在距院子百米许的沟边的窑洞里，有许多窑洞还是当年师生们亲手所挖。

小何带着我走到了沟边。现在沟边砌了一道类似长城垛口的城墙，陕北公学的纪念碑就镶嵌在这城墙当中。

小何说，爷爷告诉她，当时的学生前前后后有几千号人，一个村子住不下，就分散到邻近的坪坊、门家、照庄等村中。她们村住的基本都是女生。那些洋学生，有的才十几岁，操着不同的口音，念书、唱歌、开会、跳舞，可热闹了。上课就去村子里场中间，大家席地而坐，认真听讲，很正规的。

一次，时任关中分区区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到陕北公学作报告，20来岁的他意气风发，激情昂扬，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鼓动团结抗日，在学生中激起强烈反响，掌声不断。几个女学生还拿出了从国统区带来的相机，以讲台为背景，照起照片。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同志幽默地插话：“请同学们注意听讲，仲勋同志已经结婚了呵！”

引发了全场一片掌声和笑声，还有照相者脸上的一片绯红。

回到村中，我又一次走进了旧址中的展览室，望着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名单陷入深思。

数千余人，留下名字的真不多，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更少……

照片上著名的红色女特工张露萍，露着开心的笑容。当时也就27岁，毕业后被组织派遣至四川，在国民党军统内建立红色电台，为党作出巨大贡献。1940年暴露，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抗战胜利前夜遇害。

杨展，杨开慧的侄女，1941年在日军扫荡中牺牲于河北平山县。

还有一位带着甜甜微笑的南方姑娘倪淑珍，戴一副圆框眼镜，灵动的眼睛仿佛会说话，时年22岁，从家乡江苏吴江远奔西安转赴旬邑进入陕北公学，毕业后先后在关中分区和晋察冀公安局工作。1943年10月11日夜，宿营于涇源县桦木沟村时，被日寇包围，她坚守阵地，掩护战友撤退，12日凌晨中数弹牺牲……

这些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学生，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过早地就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留给我们的除了敬仰，还有无尽的惋惜。

告别小何，我的思绪依然沉浸在抗战的烽火和学员们的青春中。同时也在想：看花宫如此小小的村落，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竟容纳了这么多民族的精英。

此时，在我看来这些树啊、花啊，仿佛全是陕北公学员们伟岸的身影和甜美的笑容。

